

推動黨外組織化的人

議會運動家——謝長廷



謝長廷參與黨外，就個人選擇而言，是行有餘力回饋社會，就客觀環境而言，則是具有先進思想的中產階級投身政治改革的典型。

「後援會」實際負起「準政黨」的選舉推荐功能，照謝長廷的講法，這是黨外朝組黨方向發展的嚐試，但也可淪為公職人員互相保障的工具。

公政會在各縣市成立分會，成為黨外最主要的團體，從而建立「黨外黨」的縣市黨部，這是謝長廷「柔性政黨」的具體化。

接受「次團體」的理論，使他的柔性政黨面臨考驗，若不是轉化成剛性政黨的聯盟，就會變成自民黨內派系，他當然是中意後者。

他肯定群眾運動路線，其實也是一種彈性的表示，他強調議會改革路線與群眾運動路線的重疊部份，小心地避開了歧異甚至矛盾的部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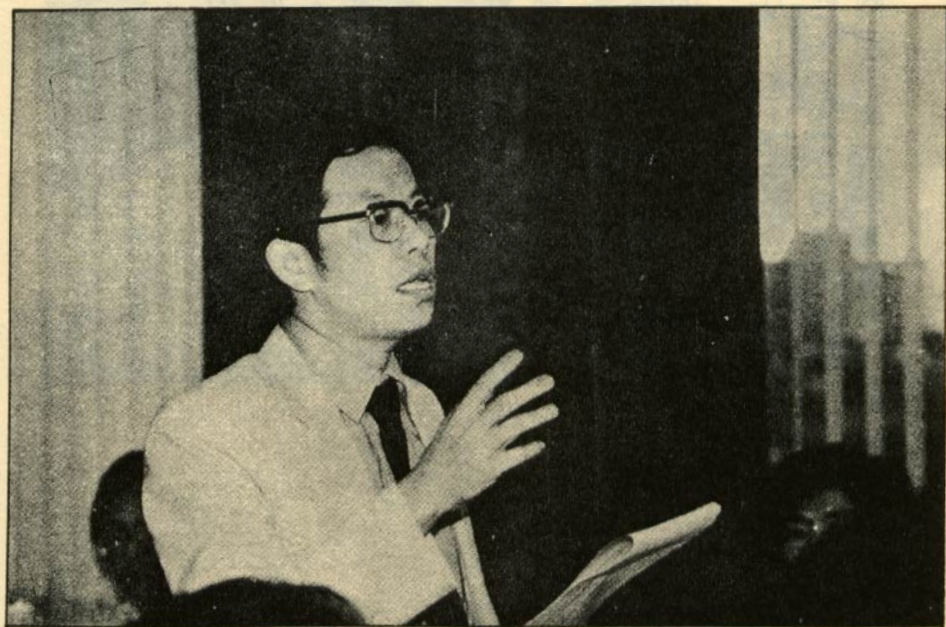
謝長廷具有過人的理解力與親和力，他比大部分公職更具理想性，但較新生代更具妥協性，因此在複雜的台灣政治環境中，他只能困知勉行地向自己的目標邁進。

目前任何人談出色的黨外政治人物，都會提到謝長廷。這位個子不高，長相不瀟灑，只擔任市議員的律師，能在短短四、五年內成爲海內外政界注意的對象，的確有其過人之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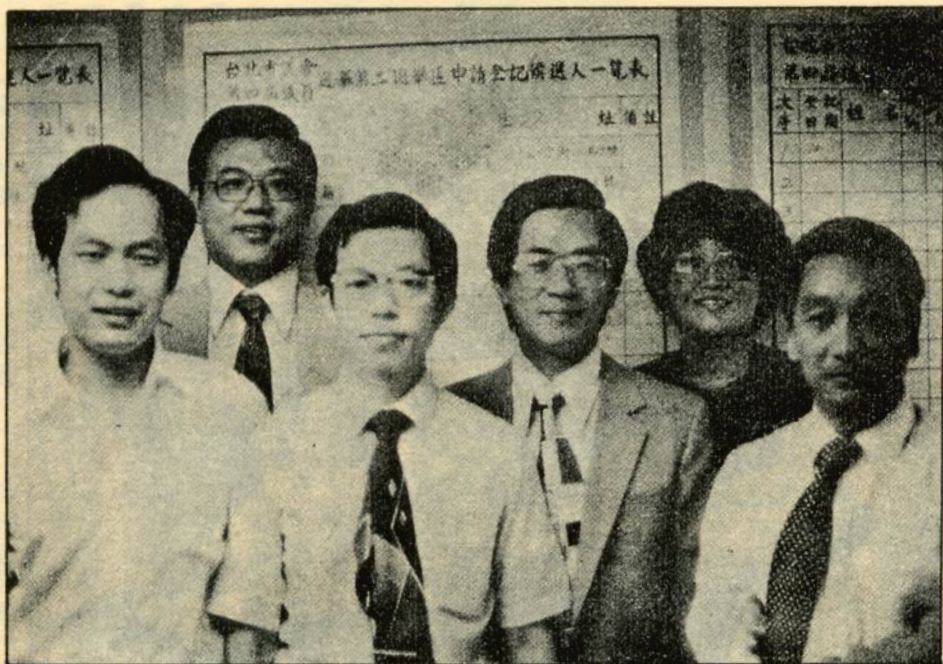
他崛起於急劇變動的黨外陣營，卻很快地適應了環境，不久就變成要角。他在兵慌馬亂之際加入黨外，增加了黨外的力量，也展現了個人的才幹。

對於美麗島大劫之後的黨外，他有相當傑出的貢獻。他兼容四方，在公職、幹部、家屬、律師群之間發揮潤滑作用；他參與活動，不論大小場合，他都是中堅份子，也是核心智囊；他提倡理論，協助黨外脫離孤立山頭的經營模式，向組織型態邁進。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，他的表現都極具正面意義。

然而，跨越這個階段之後，黨外還得面對更大的考驗，台灣政局在變，黨外路線也要變，對外要衝破政治瓶頸，對內要翻新組織結構，在此時刻，謝長廷在主觀上願意或是在客觀上能扮演什麼角色，值得給予密切的注意。



* 謝長廷是極佳的演講者（1982年）



*謝長廷在康寧祥等人陪同下，登記參選市議員（1981年）

謝長廷參與黨外，就個人選擇而言，是行有餘力回饋社會，就客觀環境而言，則是具有先進思想的中產階級投身政治改革的典型。

早在一九七七年姚嘉文、林義雄兩位律師參政之前，謝長廷就是律師圈內關心政治及社會發展的一員，他所接近的都是台籍律師，政治立場上傾向黨外，又參加「平民法律服務中心」，結合一批較有進步理念的同業，共同為低下層民衆服務。就個人選擇而言，這是他行有餘力回饋社會的方式，多少帶有不自己艱苦出身的意味；就客觀環境而言，具有先進思想的中產階級會產生改革政治的念頭，也是必然的趨勢。

然而，身為律師，接觸到的都是社會有力人士，所參與的又是企業家、學者、醫師、律師等類人所組成的社團，這使他的政治思考方向，帶有強烈的中產階級保守改革色彩，就是：政治上，在正視現實的前提下做漸進的革新；經濟上，在維持資本主義的前提下照顧工農階級的權利；社會上，在承認不平等現狀的前提下設法改善社會福利。



* 謝長廷抗議內湖垃圾山的污染（1984年）

許多人了解謝長廷的政治路線，以為他搖擺不定，事實上，四、五年來他一直循著剛參政時所擬定的方向走，在「從法庭到議會」的訪問稿中，他就清楚地主張黨外「在觀念上，應拋棄革命情緒，努力扮演改革者的角色；在路線上，可以改走服務路線和議會路線」。幾年來，儘管他發表的論點變化無窮，但是基調如一，不論在內外關係、政黨問題、組織結構、選舉動員等方面，都沒有脫離原定的範圍。

他表現方式的變化，來自聰明才智。他一直嚐試用各種可能的方案，來鋪陳其政治路線。

謝長廷從政時間雖然不長，但是提出的組織構想卻很多，而且每提出一項，就引起許多人的討論，成爲黨內外的話題。其中原因可能有四點：其一，他企圖心強，想要有一番作爲，很認真地在觀察與思考；其二，他善於利用知識見聞，經常將別國的制度加以修正，以求適用於黨外發展；其三，他擅長吸取其他黨外人士的見解，融會貫通以後，涵蓋面自然增大；其四，黨外有如一片處女地，理論開發極有用武之地，適合他發揮長處

。結果，他以這些構想短期內急速竄起，成爲各方看重的政治新星。

一九八二年五月，謝長廷提出「柔性政黨」的構想，距離他首度當選台北市議員只有半年。此一構想，雖然靈感來源是美國的政黨制度，但日本自民黨組織架構恐怕對他更有影響。他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前往訪問，回台不久就整理出柔性政黨的構想，雖然反應見仁見智，但是他用心之深沒有人否認，尤其他以新人身份提出整體架構問題，更是令人矚目。

八三年立委選舉，他又參考日本選舉組織的作法，提出「後援會」的構想，距離他正式參政只有兩年的時間。「後援會」草案的擬定，對黨外運動有重大的影響，他獲得新生代的廣泛支持，對大部份公職人員構成很大的壓力，但使黨外選舉組織化向前推進一步。結果是擠入黨外領導階層，聲望直逼康寧祥與尤清等人。

今年年初，他提出對國內政局更具影響力的構想，就是「成立公政會分會」，此舉對國民黨造成震撼，視爲組黨的前奏，因此有所謂「溝通」；在黨外內部則造成風潮，數月之內許多縣市紛紛成立分會，連對公政會最不滿意的康寧祥、張德銘、黃煌雄等人都不得不順應時勢，至此，謝長廷已成爲黨外內部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。

「柔性政黨」、「後援會」、「公政會分會」這三

大構想互有關聯。「柔性政黨」是他腦海中黨外整體組織架構，也是黨外組織的模式；「後援會」是「化整爲零」實現柔性政黨功能的重要組織，因爲柔性政黨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選舉；「公政會成立分會」則是柔性政黨組黨前的暖身運動，分會未來是各縣市的黨部，而總會則是以公職人員爲主體的黨中央。

謝長廷提出這些構想，並非早有全盤架構，而是逐日思想，慢慢修正得來。不過，任何人只要詳細看過他的「柔性政黨的構想」一文，就可以知道，他的構想建立在同一個主調上，就是：要推動一個以選舉爲主要運動方式，以議會黨團爲基本決策組織，以公職及精英爲黨內核心成員的政黨。

「柔性政黨」是以適應現狀爲出發點的構想，既想化解國民黨的壓制，也想省略意識型態的爭辯，又想避開派系分化的問題。

「柔性政黨」有三個特性：第一，它不強調意識型態或主義，比較重視公共政策和現實問題的解決，在台灣的政治環境中比較能夠安全地漸進發展；第二，它的組織不嚴密，黨紀較爲鬆弛，對成員沒有太大的要求，適合選舉時才動員的臨時結盟型態；第三，它將黨外現

狀加以形式化，不像「剛性政黨」那樣一切重新來過，省略了許多理論爭辯，也避開派系分化的問題。這種政黨構想看起來既安全又和諧，瞭解起來既實際又易懂，在訴求上佔有優勢。

然而，它卻一直停留在理論的層次，沒有擴大成黨外的組織風潮。因素之一，是謝長廷自己的設計仍不夠週詳，尚未找到實踐的出路；因素之二，是具有政黨知識的新生代多偏向「剛性政黨」，以致缺少助力；因素之三，是絕大部份黨外公職人員聞黨變色，反應非常冷漠。總之，他提出這個構想之後，只在黨外雜誌上引起一些稀稀落落的討論，還沒有人想到加以嘗試。

不過，由於此一構想，使謝長廷成爲討論黨外組織化的要角之一。至此，黨外內部有關組織化的見解分爲四個部份：

一、偏向柔性政黨的康寧祥，實際從事各地公職及山頭的串連。

二、正式提出「柔性政黨」的謝長廷，顯然仍停在理論層次，但組織架構已脫離個人色彩。

三、偏向剛性政黨的新生代，實際醞釀「次團體」的組織，但遭遇擬定政治綱領的難題。

四、正式提出「剛性政黨」的尤清，成爲組黨呼聲最高的急先鋒，但遲遲未能擬出政黨綱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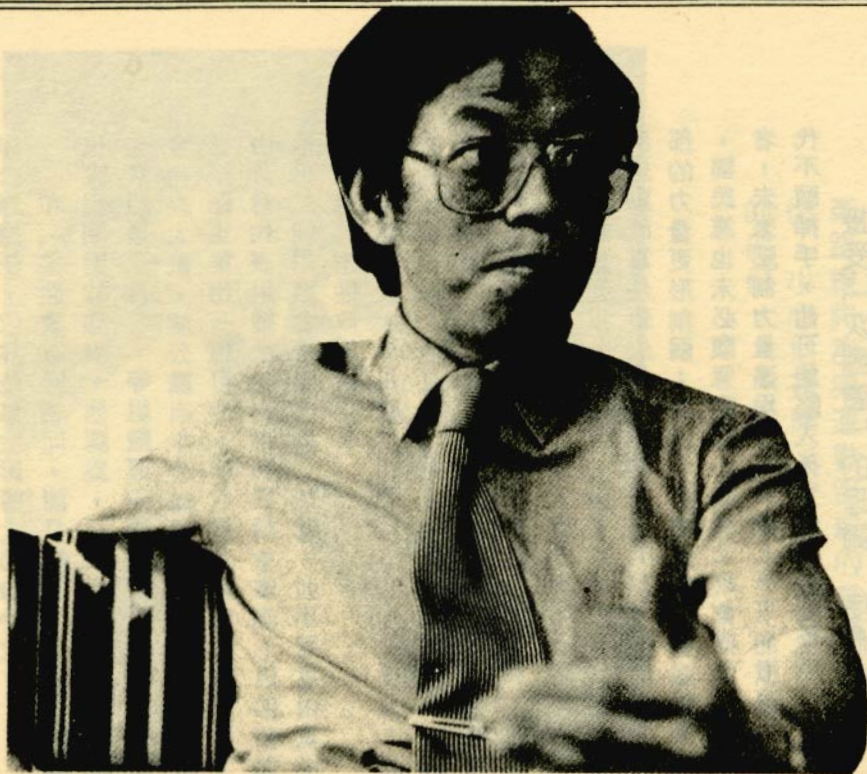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謝長廷很小心地表現彈性，並且只賦予柔性政

黨階段性的意義，保留向剛性政黨開放的可能性，甚至表示未來時機成熟時自己也願意參加剛性政黨；可是，他心思與活動的重心，都放在柔性政黨範圍之內，畢竟，這是他個人信仰及階級性所接近的模式。

「後援會」實際負起「準政黨」的選舉推荐功能，照謝長廷的講法，這是黨外朝組黨方向發展的法嘗試，但也可能淪爲公職人員互相保障的工具。

謝長廷的彈性，表現在他既能接受新生代權力平等的要求，也能容忍公職人員壟斷後援會的事實，前者表現他的進取性，後者表現他的妥協性，兩者看似有奇異的融合。其實，從他對「一九八五年後援會」的主張來看，他理想中後援會的成員結構是如此：由公職人員掌握穩定多數，以推動議會改革路線，再加進其他黨外幹部，讓他們分享部份權利，一來增加整體的號召力，二來消除內部批判的後遺症。

從組織化的角度來看，謝長廷把選舉納入軌道之中，功績不可磨滅。可是他推動「後援會」的成功，無疑也含有因緣際會的成份，因爲將選舉納入組織軌道，是新生代及較具進步思想的公職人員的共同期望，所以他得到很大的助力，不僅實現了抱負，也躍居黨外領導成



* 謝長廷與新生代溝通（1985年）

員之一，還成爲新生代票選未來黨外領袖的第一位。然而，等到他進一步推展「公政會成立分會」的構想時，議會改革路線的色彩更加明顯，他就失去新生代的支持，獨自處身在黨外公職之中，就他個人而言，他的理想雖向前推進了，卻也更加寂寞了。

公政會在各縣市成立分會，成爲黨外最主要的團體，從而建立黨外黨的縣市黨部，這是謝長廷「柔性政黨」的具體化。

到目前爲止，謝長廷對黨外影響最大的，無疑是提出「公政會設立分會」的構想，他不僅是組織理論的提供者，還是實際運作的推動者。從整個設計來看，這是「柔性政黨」的具體化，同時是正式組黨最重要的步驟之一，因爲分會未來的地位將等同於縣市黨部，至於其他黨外團體，將是黨中央之下的分支單位。

公政會總會與分會關係的設計，和日本自民黨極其相似。自民黨黨中央由國會議員及各縣市一名代表組織，有修改黨章、擬定重大決策之權，公政會的總會則由現任或曾任公職者爲基本會員，再吸收分會理事長爲總會會員。這種結構，毫無疑問是由公職居穩定多數，可說是名符其實的議會政黨，即使未來分會理事長一律由

非公職擔任，依然是無法影響大局的少數。

和「柔性政黨」相同，謝長廷在「公政會」問題上也表現開明的態度。他認為，目前的設計是適應現狀，先求組織化再說，等組織運作穩定之後，可以增加各分會代表人數，使公職與非公職的不平衡狀態得以改善，甚至他也提出一種可能，即取消公職為當然會員，完全由分會代表組織總會，再別立議會黨團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仍然強調議會黨團的獨立職權，並不同意由黨中央指揮議員的剛性政黨模式。

至此階段，謝長廷開始面臨三方面的壓力：其一，在公政會內部，他目前並不具有串連的實力，隨時有被擠出決策圈外的可能，只要一些公職人員基於共同的利害，相約扭轉公政會的方向，就能操縱大局，在公政會總會理事選舉時他只得一票，就是值得警惕的實例；其二，他越推進以公職為主的議會路線，就越遠離志在群眾運動的黨外新生代，變助力為阻力，使他在公政會內部的力量更形削弱；其三，即使像公政會這種柔性政黨，國民黨也未必願意容忍。他是公政會成立分會的推動者，未來壓制力量遽增時，公職人員可能撤退，而新生代不願插手，他可能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。

接受「次團體」的理論，使他的
柔性政黨面臨考驗，若不是轉化
成剛性政黨的聯盟，就會變成自

民黨式的黨內派系，他當然是中
意後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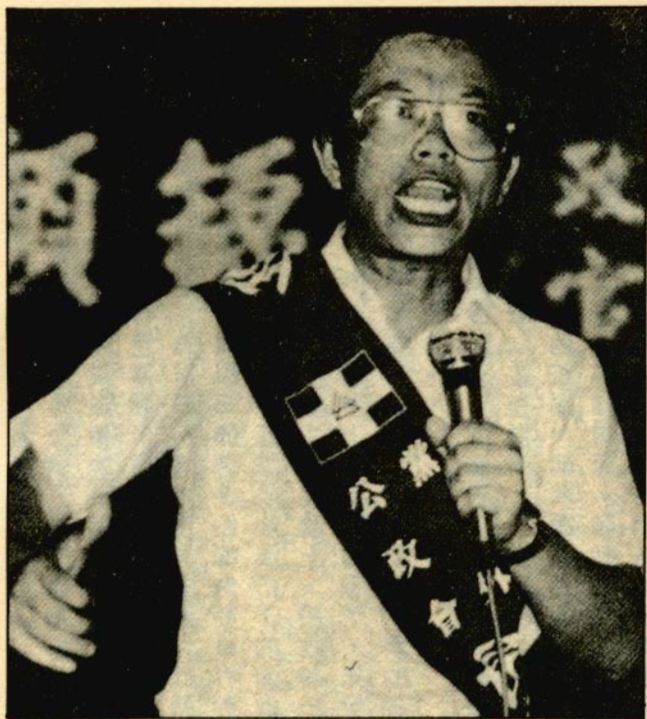
在謝長廷的組織化構想形成的過程中，最明顯的修正就是接受新生代的「次團體」理論，因此有「柔性的黨外，剛性的次團體」的說法，這是他兼容並蓄，吸收強調意識型態的新生代的一種嘗試。

此一嘗試，成功的可能性很低，剛性的次團體極不可能結合成柔性的政黨，充其量它們只可能是剛性政黨的聯盟，因為標準特定意識型態與政治路線的次團體，不可能在政黨的大傘下放棄他們原來的信念。只有那些原來意識型態就不強，靠利益、或是選舉而結合的派系，才可能安於柔性政黨的架構之內。

像日本的在野黨，多數具有特定的意識型態與政治路線，他們就無法配合成一個像自民黨那樣的柔性政黨，即使在可能組成聯合內閣的強大誘因之下，也是各執己見，難以合作。相形之下，自民黨本身沒有剛性綱領，底下派系也不具強烈的意識型態，政治路線也是大致相同，在共同利益下自然形成柔性政黨。

從謝長廷的整個設計來看，他實在沒有接受「剛性的次團體」的道理，因為這樣一來，柔性政黨勢必轉化成剛性政黨的聯盟。他真正能接受的，應該是「意識型態其名，派系結合其實」的次團體，這才合乎他的柔性政黨理論。

他肯定群眾運動路線，其實也是一種彈性的表示，他強調議會改革路線與群眾運動路線的重疊部份，小心地避開了歧異甚至矛盾的部份。



* 謝長廷在『黨外組黨說明會』中演說（1986年）

兩年前，謝長廷在黨外雜誌上寫了一篇「群眾運動路線的再肯定」，這篇文章給人一種贊成群眾運動路線的印象，使一些人認為他依違於議會改革路線之間，企圖兩面討好，其實並非如此，他主張的是一個走議會改革路線的人所願意兼顧的群眾動員行動。

一般為維護各種自由權利與生活利益而舉行的聚會、演講、遊行等抗議行動，較進步的議會改革路線者在做，主張群眾運動路線者也在做，不過，兩者仍然有很大的不同：

第一，出發點不同。主張議會改革路線的人參與這類活動，是為了抵抗現有權益的被侵害，基本態度是肯定現狀，因此他們的抵抗是被動性的、防禦性的、偶發性的；主張群眾運動路線的人舉行這類活動，則往往含有運用群眾壓力建立新體制的用心，基本態度是否定現狀，因此他們的行動是主動性的、積極性的、經常性的。根據謝長廷的論述，他顯然是屬於前者。

第二，領導重心不同。公職人員在群眾動員行動若居於領導地位，往往具有掌握並限制其行動範圍的用意，他們只有個別的目標，而無長遠的計劃，因為他們熟悉的是議會改革行動；反之，若由包含公職與非公職的黨部來領導，才可能將群眾動員視為日常工作，而設法擬定長遠的工作計劃。在謝長廷看來，群眾動員行動由誰領導，似乎是實力的問題。

謝長廷並不排斥群眾運動路線，實際上，他也是參加群眾動員行動最多的黨外公職人員。他指出，從事群眾動員行動必須注意客觀條件的限制，注意吸收經驗及技巧，加強民衆的心理建設，這些注意事項都正確無比，但他顯然傾向由公職領導的抵抗性群眾動員行動。

謝長廷傾向由公職領導的抵抗性群眾動員行動，原因有二：在主觀上，符合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漸進改革心態，穩定掌握，慢慢改革；在客觀上，給社會一種理性溫和的形象，不會觸動中上層階級的恐慌，比較容易取得這些有利人士的支持。可以說，對於台灣的政治生態，他是接受多於反抗的。

謝長廷對「制衡路線」的修正，也是基於同樣的考慮。他將原來主張的「議會制衡」，擴大為「社會制衡」，以突破衆人所知的瓶頸。他呼籲黨外人士在議會制衡之外，多多投入社會各個層面，發動多元性的制衡。這在一心只想固守個人及山頭勢力的黨外公職群中，可說非常難得。不過，制衡力量的主要場域依然是議會，所以他所提出的任何組織性規劃都以公職人員為主。

謝長廷具有過人的理解力與親和力，他比大部份公職更具理想性，但較新生代更具妥協性，因此在複雜的台灣政治環境中，他只能困知勉行地向自己的目標邁進。



* 謝長廷參加『五—九綠色行動』抗議戒嚴（1986年）

謝長廷在政壇快速崛起，除了他的三大組織化構想之外，過人的理解力和親和力應是主要因素。在黨外陣營中，他是極少數能夠適切地瞭解別人見解，並且切中主題地和人溝通的人。由於這種能力，他提昇了自己的參政境界，也帶動了黨外整體的政治水平。同時，他對黨外同志也付出應有的關懷，不論對政治犯、家屬、幹部，他都表現熱誠，在黨外各種聚會中，他出現的頻率最高，也得到最多的友誼。

但溝通與友誼，在政治圈內顯然不是真正的重點。一九八一年康寧祥和他製作「民主對話錄」，雙方有良好的合作的開始，但不久就分道揚鑣。隨後他提出「柔性政黨」、「後援會」等構想，都得不到以康寧祥為核心的公職人員的反應，甚至逼到最後出現截然對立的局面。到「公政會成立分會」時期，他取得理論的主導權，但在實際的掌握上他卻落下風。這種衝突，涉及基本路線的因素甚少，與權力分配的關係較大，他要倡導理想的公職，倡導「由優秀公職領導黨外」，顯然受到頑強的實力至上論者所抵制。

謝長廷和公職圈中的家屬系統相處也不是非常融洽，因為家屬系統的政治行為變化幅度極大，有時過度激烈，有時過份妥協，視各人需要而定。當家屬過度激烈時，他是被動跟隨，當家屬過份妥協時，他又沒有斷然決裂的勇氣。整個說來，他對家屬是抱著牽就的態度，

因此在「絕食事件」中，他成為傳達家屬決定的代言人，在「蓬萊島誹謗官司」的前後過程中，他也成為代罪羔羊，聲望都遭受打擊。但即使如此，他依然是家屬最信任的人。

謝長廷和黨外新生代的關係最為微妙，他是和新生代最能溝通的人，但新生代主流份子和他卻有意識型態及政治路線的歧異。他主張漸進改革，新生代主張全面改革；他的組織化以現狀為基礎，新生代的組織化以理想為基礎；他主張柔性的政黨模式，新生代主張剛性的政黨模式；他採取議會路線，新生代採取群眾路線。簡單一句話，他主張潛移默化地改變政治生態，新生代主張積極迅速地革命政治生態。所以在「後援會」初期的短暫合作之後，雙方的距離就越來越遠。到「五一九取消戒嚴行動」及「成立公政會分會」後，雙方的見解差別更大。新生代批評他「為組織而組織」、「將現狀形勢化」都沒有錯。但他另有一套說法，雙方的思想歧異是基本而難以改變的。

夾在公職、家屬、新生代隙縫中的謝長廷，立場尷尬而難為，他享有今天的聲望，個人的努力與熱誠是最重要的因素。但現在他已遭遇政治生涯的瓶頸，未來的進一步突破，要看他是否能提出更好的政治構想，是否能表現更具決斷的魄力！